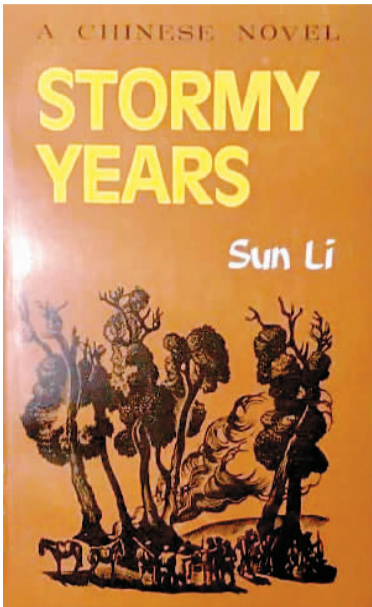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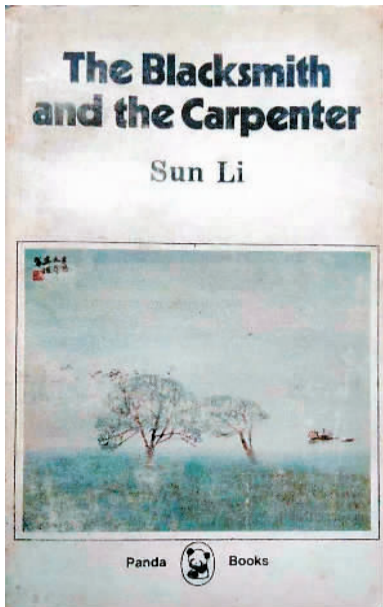


◎中国经典作家在海外

# 孙犁：从“清荷”到“淡菊”

刘卫东

孙犁青年时期即以《荷花淀》成名，但并未大红大紫；中年生病，封笔二十余载；晚年笔耕于“芸斋”，崇尚“人淡如菊”。青年孙犁和晚年孙犁创作旨趣大有不同，故以“清荷”“淡菊”两种风格名之。以往研究者更多把目光投向青年孙犁，关注他作品中主题的独特和叙述的诗意，即“清荷”一面。新世纪以来，孙犁研究明显发生两个转向，一是更为关注晚年孙犁的“淡菊”风格，二是建构整体孙犁，阐发两个阶段之间的关系。受各种因素影响，海外对孙犁的评价与国内并不同步。通过对照青年孙犁、晚年孙犁两个创作阶段，可以看出其海外译介的情况及特点。



孙犁作品部分译本

## 被广泛译介的青年孙犁

青年孙犁时期，指孙犁上世纪30年代开始写作到上世纪60年代初搁笔。这一时期，对孙犁作品的翻译和介绍已经开始。上世纪50年代初，孙犁属于被重点培养的青年作家。1951年底，孙犁参加了访问苏联的中国作家代表团，同行者有柳青、魏巍、李季、康濯、徐光耀等，都是文坛青年才俊。作家代表团由冯雪峰任团长，一个多月时间内访问了莫斯科等地，参加多项文学活动，受到苏联作协热情招待，扩大了作家在苏联的影响。孙犁由此走向了“世界”，近距离体验了苏俄文学生态，回国后写了多篇访苏纪实。

上世纪50年代，中国积极向海外推介优秀文学作品。古典文学、现代文学的佳作，被精心挑选后，成规模地译出。1951年，外文局创办了《中国文学》，以丛刊形式定期出版，有计划地进行外译工作，成为展示中国文学的重要窗口。《中国文学》英译本索引手册（胡志挥编，译林出版社1993年版）中的很多作品，就来自《中国文学》。孙犁小说颇受《中国文学》关注。1961年，《中国文学》发表了《铁木前传》。1964年，

《黑夜之美》收录了庞井君的25篇散文，每一篇都向读者呈现出生机恣意、思致幽妙的生命意象和人生图景。

庞井君哲学专业出身，他的散文，与其说是个人经历的文学表达，不如说是内心哲思的艺术传达。散文，是他抒发情感、拓衍思维、放飞灵魂、高扬精神的一个途径。情韵和哲思的片片闪光，在他笔下生成缤纷诗性的翩翩意境，书写着生命诗意的华章，彰显着精神不息的跋涉。

《黑夜之美》中的篇章，从题材上大体可分为“故乡”和“世界”两类，分别是第1篇《父亲的力量》到第11篇《哀老五》，第12篇《岁月静宜》到第25篇《小城夜思》。这些文字，贯穿了作者从天真懵懂的儿童到历经世事的成年，回首往事，一切过往化作那幽深健朗的落纸云烟，呈现出雾风淡远、穿越时空的深沉。

《父亲的力量》作为首篇，既是写实，也是象征。我们得以窥见在作者记忆深处，那个饱满至情的全力托举。这个托举，来自父亲的挚爱与坚韧，给作者以自我成长的勇气、底气、力量。在随后的篇章中，少年时推开践踏野芍药花的校长，青年时坚定地踏上开往北京的列车，中年时穿过薄雾在苏堤上边走边读书，这些宝贵的人生旅痕，被一一记录下来。当作者将自己的身心沉浸于幽谷深邃、林海茫茫的八大公山；当作者一手举伞、一手拄杖，手脚无力而又坚定地行走在冰川河谷上；当作者转过山弯，爬过高岗，和友人一起在草原上围着火炉搭起地铺……对人、对生命、对自然、对宇宙的热爱，通过自由

## 内心哲思的艺术传达

金雅



庞井君的《黑夜之美》，让人在心灵中泛起涟漪，引读者不禁跟随作者念念难舍的思与想，去叩问生命之意义，探寻人生之美好，发现精神之价值。作者在书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——至性至情就好，至真至善乃美。

（作者系浙江理工大学美学中心教授）

发表了《孙犁小说选》，收录《吴召儿》《丈夫》。1966年，发表了《村歌》。其时，翻译家戴乃迭正处于活跃期，将多部孙犁作品译出，推荐给国外读者。1962年，戴乃迭翻译了孙犁的《山地回忆》和《芦花荡》，发表于《中国文学》第9期。《风云初记》片段发表于《中国文学》1963年第9期；《光荣》发表于1965年第10期。由此可见，“青年孙犁”被翻译推介的频率很高。

这些被选中的孙犁作品，既属于革命历史叙事，又具有较高的文学性。孙犁的辨识度在于，他参与了以豪迈、粗犷为美学底色的革命叙事洪流，又具有独特的个人视角，显现出柔美、克制的“清荷”风格。在硝烟炮火中，他闻到了荷花淀飘来的阵阵花香。正如《荷花淀》中的经典描写：“这女人编着席。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，就编成了一大片。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。她有时望望淀里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。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，风吹过来，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。”这类在革命历史题材中独树一帜的作品，符合《中国文学》的定位，大概也是孙犁

受到遴选者青睐的原因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一些海外研究者将孙犁作品划入抗日小说的范畴，而在这个框架中，孙犁作品的独特性被忽略，比如美国学者夏志清就没有在他的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中提及孙犁及其作品。其对革命作家的态度，受到了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普实克的批评，后者给予解放区文学很高评价，认为“发生在解放区生活各个方面的种种变迁，也许是中国人民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”。整体来看，冷战时期的研究者还未能认识到孙犁作品的独特价值。

## 有待重新定位的晚年孙犁

上世纪70年代末，孙犁重返文坛，出版了《芸斋小说》及大量散文。晚年孙犁可谓“衰年变法”，知人论世，都与此前的“清荷”风格不同，形成独立傲岸的“淡菊”风格。如何分辨、统一两者间的关系，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问题。学者杨联芬在1998年的论文中，将孙犁定位为“革命作家中的‘多余人’”，不再把孙

## ◎新作评介

# 书写科技创新的崭新题材

许春樵

了解既往岁月，各种史书是权威依据。而文学，不仅记录时代、见证时代，同时也在参与建设一个时代。当《追风》直面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的时代，全方位记录一座城市凤凰涅槃的传奇，深度挖掘理想信念与人性精神的默契对接和相互成全，文学就成了另一种历史——一种活着的历史，有情感、有温度的历史。

这是一个不断提供全新写作资源和写作空间的时代，规划新的创作方向和写作路径拥有诸多可能性。当代文学中，出现一大批贴近时代的主题性创作，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写土改，《创业史》写合作化，《乔厂长上任记》写改革开放。改革开放后，工业化进程飞速发展，科技创新站到了时代前沿，创新驱动发展成为国家战略，新题材应运而生。洪放抢先一步，以某省会城市南州为典型，写出了这部科技创新题材的长篇小说《追风》。

当然，仅有好题材是不够的，洪放还要遵守“文学的纪律”。

小说首先解决了“以人为本”的问题，不少主题性创作常常将重心放在故事设计上，以至于淹没了人物。这本小说写时代、写故事，但核心是人。抱定理想信念，一路披荆斩棘；阳刚豪迈的男子汉，又免不了英雄气短、儿女情长，这就是小说中有血有肉、鲜活生动的南州市市长杜光辉。他首先是一个生动的人，然后才是一个践行科技创新的市长。小说将他放在父亲、丈夫、恋人、朋友、同学、同事这些“人的本性”角色上去刻画和塑造，避免了人物标签化和扁平化。

其次是在结构与情节上进行了精心设计。现实主义长篇小说遵循的是传统的或者说是经典的技术规范，戏剧冲突和人物关系的戏剧性是重要的技术支撑。《追风》的故事结构中，人物关系、情感关系处于不断变化

型框定在传统的叙述范畴，而是发掘他更为独特的因素。评论家李敬泽2002年的《半个世纪两个孙犁》，传达了同样的研究旨趣。这一时期，孙犁作品的海外译介情况，亦有变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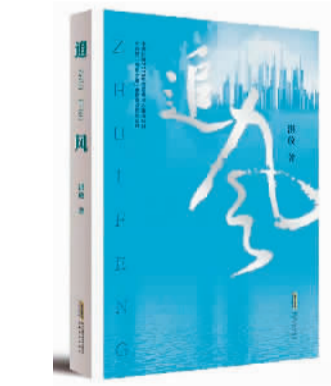
上世纪80年代初，孙犁重回出版视野。1982年，《荷花淀》由外文出版社出版，《孙犁小说选》由《中国文学》杂志社出版。1982年、1983年，《风云初记》的英文、法文版相继出版。如此看来，孙犁的译介与写作产生了一个“滞差”：写作进入晚年孙犁阶段，但译介出版的作品，仍然是青年孙犁时期的代表作。

在研究方面，海外学者对孙犁的特殊性有了新认识。德国汉学家顾彬不再先入为主地划分作家阵营，对孙犁的评价也随之面貌一新。顾彬认为，孙犁是“解放区成长起来的最重要的作家”“甚至是新中国的伟大叙事者之一”“写出女性战友们‘美的心灵’”。

稍感遗憾的是，晚年孙犁的作品还较少被翻译出去。很多海外研究者认为孙犁的创作在上世纪60年代就终结了，这个错觉也影响了对孙犁的整体判断。比如 Rosemary Maeve Haddond 在关于中国“乡土小说”的博士论文中，专辟了“荷花淀派与孙犁”（Hehuadian school and SunLi）一节，把孙犁置于乡土叙事传统，仍然沿袭了以前的思路。因此，如何重估“晚年孙犁”的价值，将其推介给世界，形成完整的“孙犁形象”，是一个亟须重视的问题。

孙犁青年时，“荷花淀派”与“山药蛋派”相提并论；孙犁晚年时，曾有“南巴（金）北孙（犁）”的说法，由此可见孙犁的文坛地位。孙犁崇尚淡泊，自甘“边缘”，但新世纪以来，孙犁研究一直保持着较高热度，国内平均每年发表百余篇学术论文。随着国际学术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增强，相信孙犁的“清荷”“淡菊”风格都会得到海外学术界的关注，同放异彩。

（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）



中，科技创新的艰难历程也充满了矛盾冲突。撤销工业园区时宗一林对杜光辉的明暗对抗、科技创新推进中杜光辉与同僚的分歧等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将杜光辉这一人物形象置于多重矛盾中去刻画，既完成了杜光辉人性化的设计，又在人物的多重困境中揭示了科技创新的艰巨性、复杂性和必要性。通过故事展开和情节推进中不断设计对抗和冲突，体现了小说呈现“有难度的生活”这一追求。

第三就是在宏大叙事中保持了诗性追求。主题性创作需要宽广的视角，但小切口是回归世俗化和生活化的写作起点。杜光辉一到南州，拒绝了接风洗尘的宴请，独自到城隍庙地摊上喝“南州老鸡汤”，寻找当年在南州读书时的青春记忆，这段描写以及反复出现的小鹏堆砌沙雕的情景，还有与孟春的故事，都写足了细节、写出了诗意。这些诗意和诗性成分在《追风》中虽说不多，但极其重要，这些场景和细节的不断重复穿插，是为宏大叙事的一种平衡和融入，为主题性创作粗犷坚硬的气质注入了柔美与温情。

如果未来的人们想了解21世纪中国科技创新的这段历史，也许有人会说：“去读一读《追风》吧！”（作者系安徽省作协主席）

# 远道而来 满载而归

本报记者 张鹏禹

北乔与他的临潭扶贫故事

北乔写诗，也写散文、小说、评论。他当过兵，出版过军旅题材长篇小说《新兵》《当兵》，也有评论集《贴着地面的飞翔》《约会小说》问世，但如果不是因为脱贫攻坚，他怎么也不会想到，人到中年会出版一本关于临潭的散文集——《远道而来》。

“远道而来”，一个令人遐想的名字。从北京远道而来，他看到了什么？经历了什么？对文学和生活，又有哪些新的思考？他最直接的收获，恐怕是重新发现了文学的力量。

2016年10月至2019年9月，北乔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挂职，亲身参与到脱贫攻坚工作中。“我作为中国作协的工作人员，来临潭的主要任务是‘挂职帮扶’。但作协这样的文化部门，不像其他单位那样，拥有资金和产业项目等资源。于是在实际工作中提出了‘文化润心，文学助力’的理念，发挥文学‘扶志扶智’的作用，同时通过文学宣传临潭。”

3年来，在中国作协的支持下，物资和资金支持、后备人才培养、乡村文化建设等一系列文化帮扶举措在临潭落地。北乔还动员当地脱贫攻坚一线写作者和干部群众写身边人身边事，主编出版了《临潭有道》，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临潭70年的文学创作进行了梳理，主编出版了《洮州温度——临潭文学70年》。他还组织开展了“助力脱贫攻坚文学创作培训班”，帮助临潭文学爱好者提高创作能力；牵线搭桥为5位临潭基层作者出版著作。

“临潭在中国版图上，是个小地方，但却有说不完的故事。这些故事通过诗歌、散文、新闻报道、照片等形式在《人民日报》《人民文学》《十月》等知名报刊发表，吸引了大量关注。”北乔说。他自己也利用业余时间，创作了诸多散文、诗歌，《远道而来》中的作品，多是在临潭时写的。通过创作，他发现自己的第二重收获是对临潭风景和人的重新发现。

北乔写临潭的河，“这是一条闪亮的绳缆，草原是大海，但我没有找到船。这是一条处于放松状态的绳缆，可那驰骋的马儿在哪儿？”写临潭的古堡、寨子遗存的土城墙，“它高傲，苍凉，把辽阔站成了向上的沉默，把力量压进了沉默之中”。写临潭的特色民俗拔河，“万人拔河，在临潭得到最本真的传承。而一个最具方言特色的‘扯’字，似乎在寓示多民族间的血液于水，再扯也扯不开”。在作家笔下，临潭的山山水水、土城古堡、牌匾戏台、民歌“漫花”、美食洋芋等一一呈现，诗一般的语言钩沉起这片高原的前世今生、人文历史、民风民情。

“治力关的水，如故乡的水。这里的人们，也是我的父老乡亲。”北乔写道。在与当地人打交道的过程中，淳朴的乡亲们抚慰着他的乡愁。书中记录了作家向一位大姐讨茶攀谈，喝到了平生最有滋味的一次茶；得知一位妙龄女子在丈夫入狱服刑后，独自撑起家庭重担后的钦佩；还有临潭人物群像“父老乡亲”一节中的父子、做羊蹄的后生、刻



刻匠木雕艺人、乡村画师、喝盖碗茶的老人、走村入户的乡干部等，每个人都是从生活中来的“这一个”。

“这完全是生活馈赠给我的礼物。”北乔说。如果说收获，他认为最大的还是重新认识了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对于创作的意义。《远道而来》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：看到自己亲手挖出的洋芋，北乔满心欢喜，可旁边劳作的小伙子却显得心情不好。一番攀谈后，他认识到，农民所谓的快乐，比如丰收的快乐，比如相互间的说笑，只是一个瞬间，无法替代那些长长的白天黑夜。就像挖土豆，挖一个一筐半筐的，边挖边玩，确实挺有趣，也有美感。可五六亩地，需要两三天挖完，成千上万次重复几个动作，就是另一回事了。

在劳动中，北乔发现了写作的真谛。“我想到了现在文学里的乡村叙事，多数情况，只是我们自以为是的乡村叙事，而非农民心中和日常生活中的乡村叙事。这绝不是只靠记忆和简单的体验生活就能弥补的，我们必须得在心灵和感觉上重回今日的乡村才行。”

## 展现中国散文百余年创作成就

据悉，该丛书计划收录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近80位散文名家的精品力作。此次推出的第一辑共40本，包括鲁迅、郭沫若、许地山、叶圣陶、郁达夫、徐志摩、朱光潜、宗白华、丰子恺、朱自清、老舍、冰心、沈从文、丁玲、巴金等作家的作品集。

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、《人民文学》主编施战军认为，散文拥有广大受众，最能展现个性之我。这套丛书既适合闲读，也适合研读，既适合目标性阅读，也适合沉浸式阅读。

